

佛 教 十 三 经

楞严经

赖永海 主编

刘鹿鸣 译注

中华书局

佛 教 十 二 经

楞严经

赖永海 主编

刘鹿鸣 译注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楞严经/赖永海主编;刘鹿鸣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8
(佛教十三经)

ISBN 978 - 7 - 101 - 08797 - 0

I. 楞… II. ①赖…②刘… III. ①大乘 - 佛经②《楞严经》
译文③楞严经 - 注释 IV. B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3687 号

书 名	楞严经
主 编	赖永海
译 注 者	刘鹿鸣
丛 书 名	佛教十三经
责任编辑	刘胜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字数 28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797 - 0
定 价	32.00 元

总序

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典籍浩瀚，博大精深，即便是专业研究者，用其一生的精力，恐也难阅尽所有经典。加之，佛典有经律论、大小乘之分，每部佛经又有节译、别译等多种版本，因此，大藏经中所收录的典籍，也不是每一部佛典、每一种译本都非读不可。因此之故，古人有“阅藏知津”一说，意谓阅读佛典，如同过河、走路，要先知道津梁渡口或方向路标，才能顺利抵达彼岸或避免走弯路；否则只好望洋兴叹或事倍功半。《佛教十三经》编译的初衷类此。面对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究竟哪些经典应该先读，哪些论著可后读？哪部佛典是必读，哪种译本可选读？哪些经论最能体现佛教的基本精神，哪些撰述是随机方便说？凡此等等，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人们读经的效率与效果。为此，我们精心选择了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最能体现中国佛教基本精神的十三部佛经，认为举凡欲学佛或研究佛教者，均可从“十三经”入手，之后再循序渐进，对整个中国佛教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与研究。

“佛教十三经”的说法，由来有自。杨仁山、梅吉庆以及中



国佛学院都曾选有“佛教十三经”，所选经典大同小异。上述三家都选录的经典有：《金刚经》、《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伽经》、《楞严经》；被两家选录的经典有：《心经》、《胜鬘经》、《观经》、《无量寿经》、《圆觉经》、《金光明经》、《梵网经》、《坛经》。此外，《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解深密经》、《八大人觉经》、《大乘密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菩萨十住行道品经》、《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为一家所选录。本着以上所说的“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最能体现中国佛教基本精神”的原则，这次我们选择了以下十三部经典：《心经》、《金刚经》、《无量寿经》、《圆觉经》、《梵网经》、《坛经》、《楞严经》、《解深密经》、《维摩诘经》、《楞伽经》、《金光明经》、《法华经》、《四十二章经》。

佛教发展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就其历史发展、思想内容说，有大乘、小乘之分。《佛教十三经》所收录之经典，除了《四十二章经》外，多为大乘经典。此中之缘由，盖因佛法之东渐，虽是大小二乘兼传，但是，小乘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始终成不了气候，且自魏晋以降，更是日趋式微；直到 13 世纪以后，才有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一带的流传，且范围十分有限。与此相反，大乘佛教自传入中土后，先依傍魏晋玄学，后融汇儒家的人性、心性学说而蔚为大宗，成为与儒道二教鼎足而三、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既然中国佛教的主体在大乘，《佛教十三经》所收录的佛经自然以大乘经典为主。

对于大乘佛教，通常人们又因其思想内容的差异把它分为空、有二宗。空宗的代表性经典是“般若经”。中国所见之般若



类经典,以玄奘所译之《大般若经》为最,有六百卷之多。此外还有各类小本“般若经”的编译与流传,其中以《金刚经》与《心经》最具代表性影响力。

“般若经”的核心思想是“空”。但佛教所说的“空”,非一无所有之“空”,而是以“缘起”说“空”,亦即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条件(“缘”即“条件”)的产物,都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条件具备了,它就产生了(“缘起”);条件不复存在了,它就消亡了(“缘灭”)。世间的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念念不住的过程,因此都是没有自性的,无自性故“空”。《金刚经》和《心经》作为般若经的浓缩本,“缘起性空”同样是其核心思想,但二者又进一步从“对外扫相”和“对内破执”两个角度去讲“空”。《金刚经》的“对外扫相”思想集中体现在“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偈句上,“对内破执”则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点睛之笔。《心经》则是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来对外破五蕴身,以“心无罣碍”来破心执。两部经典都从扫外相、破心著的角度去说“空”。

有宗在否定外境外法的客观性方面与空宗没有分歧,差别仅在于,有宗虽然主张“外境非有”,但又认为“内识非无”,倡“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认为一切外境、外法都是“内识”的变现。在印度佛教中,有宗一直比较盛行,但在中国佛教史上,唯有玄奘、窥基创立的“法相唯识宗”全力弘扬“有宗”的思想,并把《解深密经》等“六经十一论”作为立宗的根据,《佛教十三经》选录了对“唯识宗”影响较大的《解深密经》进行注译。



《解深密经》的核心思想在论证一切外境外法与识的关系，认为一切诸法乃识之变现，阿赖耶识是生死轮回的主体，是万物生起的种子。经中还提出了著名的“三性”、“三无性”问题，并深入地论述了一切虚妄分别相与真如实性的关系。

与印度佛教不尽相同，中国佛教的主流或主体不在纯粹的“空宗”或“有宗”，而在大乘佛教基本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心性学说）汇集交融而成的“真常唯心”思想，这种“真常唯心”思想也可称之为“妙有”的思想。首先创立并弘扬这种“妙有”思想的是智者大师创建的天台宗。

天台宗把《法华经》作为立宗的经典依据，故又称“法华宗”。《法华经》的核心思想，是“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倡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同归一佛乘，主张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法华经》是南北朝之后，中国佛教走向以大乘佛教为主流的重要经典依据，也是中国佛教佛性理论确立以一切众生悉有佛性、都能成佛为主流的重要经典依据。而《法华经》的“诸法实相”也成为中国佛教“妙有”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

中国佛教注重“妙有”之思想特色的真正确立，当在禅宗。慧能南宗把天台宗肇端的“唯心”倾向推到极致，作为标志，则是《坛经》的问世。《坛经》是中国僧人撰写的著述中唯一被冠以“经”的一部佛教典籍，其核心思想是“即心即佛”、“顿悟成佛”。《坛经》在把佛性归诸心性、把人变成佛的同时，倡导“即世间求解脱”，主张把入世与出世统一起来，而这种思想的经典根据，则是《维摩诘经》。

《维摩诘经》可以说是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一部佛经，不



论是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宗，还是成为现、当代佛教主流的人间佛教，《维摩诘经》中的“心净则佛土净”及“亦入世亦出世”、“在入世中出世”的思想，都是其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经典依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贯穿于整部《维摩诘经》的一根主线——“不二法门”，更是整个中国佛教的方法论依据。

《楞伽经》也是一部对禅宗、唯识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有着重大影响的佛经。《楞伽经》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融汇了空、有二宗，既注重“二无我”，又讲“八识”、“三自性”；二是把“如来藏”和“阿赖耶识”巧妙地统合起来。因此之故，《楞伽经》既是“法相唯识宗”借以立宗的“六经”之一，又被菩提达摩作为“印心”的依据，并形成一代楞伽师和在禅宗发展史颇具影响的“楞伽禅”。

《楞严经》则是一部对中国佛教之禅、净、律、密、教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大乘经典。该经虽有真伪之争，但内容十分宏富，思想体系严密，几乎把大乘佛教所有重要理论都囊括其中，故自问世后，就广泛流行。该经以理、行、果为框架，谓一切众生都有“菩提妙明元心”，但因不明自心清静，故流转生死，如能修禅证道，即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一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圆觉经》是一部非常能够体现中国佛教注重“妙有”思想特色的佛经。该经主张一切众生都具足圆觉妙心，本当成佛，无奈为妄念、情欲等所覆盖，才于六道中生死轮回；如能顿悟自心本来清静，此心即佛，无须向外四处寻求。该经所明为大乘圆顿之理，故对华严宗、天台宗、禅宗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金光明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三身”、“十地”思想、大乘菩萨行之舍己利他、慈悲济世思想、金光明忏法及忏悔思想、以及天王护国思想。由于经中所说的诵持本经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护国利民功德,故长期以来被视为护国之经,在所有大乘佛教流行的地区都受到了广泛重视。

《无量寿经》是根据“十方净土”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净土类经典,也是净土宗所依据的“三经”之一。经中主要叙述过去世法藏菩萨历劫修行成无量寿佛的经过,及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殊胜。净土信仰自宋之后就成为与禅并驾齐驱的两大佛教思潮之一,到近、现代更出现“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景象,故《无量寿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影响至为广泛和深远。

《梵网经》在佛教“三藏”中属“律藏”,是大乘戒律之一,在中国佛教大乘戒律中,《梵网经》的影响最大。经中主要讲述修菩萨的阶位(发趣十心、长养十心、金刚十心和体性十地)和菩萨戒律(十重戒和四十八轻戒),是修习大乘菩萨行所依持的主要戒律。另外,经中把“孝”与“戒”相融通、“孝名为戒”的思想颇富中国特色。

所以把《四十二章经》也收入《佛教十三经》,主要因为该经是我国最早译出的佛教经典,而且是一部含有较多早期佛教思想的佛经。经中主要阐明人生无常等佛教基本教义和讲述修习佛道应远离诸欲、弃恶修善及注重心证等重要义理,且文字平易简明,可视为修习佛教之入门书。

近几十年来,中国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特殊的文化、社会价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研究佛教者



也日渐增多。而要了解和研究佛教,首先得研读佛典。然而,佛教名相繁复,义理艰深,文字又晦涩难懂,即便有相当文史基础和哲学素养者,读来也颇感费力。为了便于佛学爱好者、研究者的阅读和把握经中之思想义理,我们对所选录的十三部佛典进行了如下的诠释、注译工作:一是在每部佛经之首均置一“前言”,简要介绍该经之版本源流、内容结构、核心思想及其历史价值;二是在每一品目之前,都撰写了一个“题解”,对该品目之内容大要和主题思想进行简明扼要的提炼和揭示;三是采取意译与音译相结合的原则,对所选译的经文进行现代汉语的译述。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它对原典的阅读和义理的把握能有所助益。当然,这种做法按佛门的说法,多少带有“方便设施”的性质,但愿它能成为“渡海之舟筏”,而不至于沦为“忘月之手指”。

赖永海

庚寅年春于南京大学

前 言

“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这句禅门话语道出了《楞严经》在中国佛教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本经自唐代中叶译出后便开始流行，宋代之后更是盛行于僧俗、禅教之间，成为汉传大乘佛教的最核心经典之一，是一部对中国佛教之禅、净、教、律、密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大乘经典。

《楞严经》以禅定修习之见、修、行、果为框架，以首楞严大定为中心，系统讲述了见地抉择、禅修法门、菩萨阶位以及七趣因果和五十阴魔等佛法大义，其禅观体系组织得十分严密巧妙，义理宏深，内容丰富，一经在手，见修齐备，因而被誉为佛教“教观之总纲”，素有“佛教全书”之称；其教理和禅观思想，对宋代之后的中国佛教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元代天如惟则法师称之为：“《首楞严经》者，诸佛之慧命，众生之达道，教网之宏纲，禅门之要关也。”明代高僧藕益智旭在《阅藏知津》中称赞：“此经为宗教司南，性相总要，一代法门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

《楞严经》对于修行开悟、明了宇宙人生实相真理具有特别



的意义,是能够使人入门悟道的一部书,也是抱本修行直至证果都需要带在身边的一部书。明代憨山德清大师言:“不知《法华》,则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不知《楞严》,则不知修心迷悟之关键。”由于经中对于破妄显真、破魔显正以及禅定中出现的种种魔事境界作了非常细致的讲述,故本经历来被公认为是一部禅修宝典、破魔大全。

从唐末五代以来,丛林就盛行“楞严法会”,宋元以后,楞严咒逐步成为丛林早课的中心内容,而《楞严经》的流传和讲习也随之更普遍了。

《楞严经》在唐代译出不久,就流传到了日本、韩国。在藏文《甘珠尔》中有由汉译藏的《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十品以及《魔鬼第九》两本,实即本经第九、第十两卷,据学者考证,为西藏前弘期(约当唐代)的译品。清乾隆年间,章嘉呼图克图主持,由袞波却将全经重译成藏文,并刊成汉、满、藏、蒙四体合璧的《首楞严经》全帙。

一 本经之翻译和流通

《楞严经》是在唐代中叶于广州制旨寺(今光孝寺)译成汉语,并随后开始流通。唐代著名的佛经目录学家智升将其列入《开元释教录》(编于唐开元十八年[730],是经录中集大成者,宋藏以下诸藏皆依准之)中。自北宋初年第一部雕刊汉文大藏经《开宝藏》起,直至清朝乾隆年间刊刻的《龙藏》,无一例外地将其列入“正藏”加以流通。

关于《楞严经》的传译情况,早在本经流传之初就有不



同说法，由此也引起了后世关于本经的真伪之争。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卷九中记载，罗浮山沙门释怀迪“因游广府，遇一梵僧（原注：未得其名），赍梵经一夹，请共译之，勒成十卷，即《大佛顶万行首楞严经》是也。迪笔受经旨兼缉缀文理。其梵僧传经事毕，莫知所之。有因南使，流经至此”。在同书的卷十二、卷十七则简略记为“大唐循州沙门怀迪共梵僧于广州译，新编入录”、“大唐沙门怀迪于广州译”。这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误解。智升在其后专门补充译经史迹的《续古今译经图记》中则有了详细记载：“沙门般刺蜜帝，唐云‘极量’，中印度人也。怀道观方，随缘济度，展转游化，达我支那。乃于广州制旨道场居止。众知博达，祈请亦多。利物为心，敷斯秘蹟。以神龙元年（705）龙集乙巳五月己卯朔二十三日辛丑，遂于灌顶部诵出一品《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一部十卷。乌苻国沙门弥伽释迦语，菩萨戒弟子前正谏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笔受，循州罗浮山南楼寺沙门怀迪证译。其僧传经事毕，泛舶西归。有因南使，流通于此。”这一记载，颇为全面，不但补充了《开元释教录》中情况不明的“梵僧”详情，而且增加了弥伽译语、怀迪证译和房融笔受等译经经过。智升在《续古今译经图记》中关于《楞严经》传译的补充资料，被其后的佛教目录家所采用。在稍后释圆照撰写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关于《楞严经》的传译完全采用了《续古今译经图记》的说法，而不再沿用《开元释教录》的说法。



关于本经的流通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智升《续古今译经图记》记载：“有因南使，流通于此。”即有南方的使者来奏入朝廷而得以流通。二是宋代长水子璿《首楞严义疏注经》中说：“房融入奏，又遇中宗初嗣，未暇宣布，目录缺书。时禅学者因内道场得本传写，遂流此地。大通（即神秀禅师）在内，亲遇奏经，又写随身，归荆州度门寺。有魏北馆陶沙门慧振搜访灵迹，常慕此经，于度门寺遂遇此本，初得科判。”这是说，房融奏入武则天朝廷，随后唐中宗初登基，故没来得及宣布，恰好神秀禅师在内道场接受供养，看到后传写，带到了荆州度门寺。沙门慧振正在寻找此经，在度门寺遇到此本，就作科判流通。这个“因内道场”传出的说法与智升的记载是一致的。三是宋代赞宁《宋高僧传·惟惠传》记载：天宝末，惟惠于京师“受旧相房公融宅请。未饭之前，宅中出经函云：‘相公在南海知南铨，预其翻经，躬亲笔受《首楞严经》一部，留家供养。今筵中正有十僧，每人可开题一卷。’惠坐居第四，舒经见富楼那问生起义，觉其文婉，其理玄，发愿撰疏，疏通经义”。这是说，惟惠法师在房融家供斋时，遇到了当初房融笔受留家供养的一部《楞严经》，恰好读到了卷四，见其义理玄婉而发愿撰疏，这是注疏《楞严经》之始。《惟惠传》也提到了惟惠作疏的另外一个说法：“一说《楞严经》初是荆州度门寺神秀禅师在内时得本，后因馆陶沙门慧震于度门寺传出，惠遇之，著疏解之。后有弘说法师者，蜀人也，作义章开释此经，号《资中疏》，其中亦引震法师义例。”这里说惟惠法师作注疏的起因是遇到了慧震



(即慧振)法师从度门寺传出的《楞严经》，而且还提到蜀中弘沆法师作《资中疏》也因此本。《楞严经》流通的三种说法，其实是一致的，奏入朝廷而由内道场传出也好，留家供养而传出也好，都是房融参加译经笔受本这同一来源。

由上述可知，虽然本经的翻译和流通在早期流传之初有不同说法，但从智升《续古今译经图记》之后，观点趋向一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不同观点。因此，真正引发后世关于《楞严经》真伪之争的焦点更在文义，而不在传译。但由于《楞严经》在见地抉择和禅修法门方面的非凡价值，这些争论并未影响僧俗两界对此经的喜爱和崇信。到了近代，可能是受疑古风气的影响，一些学者重启《楞严经》真伪之争，如梁启超、吕澂等人。梁氏仅凭文中“十种仙”等片语即断语经伪，十分轻率，未免有出风头之嫌疑。而以吕澂为代表的学宗唯识者，主要还是对以《楞严经》、《起信论》为代表的汉传佛教的禅观和义理有看法，或者以为《楞严经》是一种真常唯心论的学说，将之硬归为是与印度外道“梵我”的学理相同，并重新从翻译和流通的史实上、或个别文句上大做文章，以便得出《楞严经》是伪造的结论来。其深层次背景则是试图以印度佛教之正统性来否定汉传佛教之合法性，与日本学者试图以小乘经典来得出“大乘非佛说”的结论如出一辙。但无论从论证方法，还是分析结论，都难于尽信，谁也拿不出真凭实据，不过是各执己见而已。更有少数研究者，以盛唐时期文学发达、佛学兴盛为理由，直接说《楞严经》是房融所造，此种说法就如同说有一位文学家伪造了



一部最高深的数学经典一样，颇为可笑，令人难以置信。以《楞严经》义理之缜密、定境之高深、辨魔之细致，乃是大乘菩萨地之甚深境界，绝非一个尚不识初禅、二禅，也未得初果、二果，更遑论菩萨地境界的文学之士所能想、所能知，读懂尚难，更何谈撰造！要之，《楞严经》论义多为直接就禅观之见修而说，故颇有不同于他经的特别说法，诸如七大、四加行、十仙趣等，加之兼有密部内容，破邪见、破邪魔甚力，其所立名相、义理以及论证方式自难以中观或唯识的学说来衡量。近代学者据中观或唯识义而排《楞严》、非《起信》，间生诬谤，或不免偏执之嫌。

二 历代注疏

《楞严经》自唐中叶译出以来，备受各宗的推崇，历代注疏甚多，其数量之大，大概只有《金刚经》、《法华经》等少数经典可比。早期的唐代注疏三家，早已失传。现存注疏都是宋代以后的著作，大半是属于贤首、天台、禅宗三家。明末清初钱谦益《楞严经疏解蒙钞》卷一“古今疏解品目”列举自唐至明历代注疏 55 家，并对其中三十余种作了简略评述，同时判别注家之学派分属。在《蒙钞》的基础上，清代达天通理法师《楞严经指掌疏》中列举历代注疏增至 68 家（其中唐 4 家、宋 20 家、元 4 家、明 34 家、清 6 家），也作了简评，时间下限为清乾隆中期。近代以来，关于《楞严经》注疏和讲义不下十余种。《大正藏》、《卍续藏经》收录自宋代至清末的《楞严经》注疏 56 种。兹列举其中主要者如下（评语多依据《楞严经指掌疏》）：



唐代：

崇福寺惟憲法師疏(已佚。“崇福”有本作“兴福”。惟憲于唐至德初年得房融家笔授经函,发愿撰疏,勒成三卷。为此经疏解之祖)。

魏北馆陶沙门慧振科判(已佚。“慧振”或作“慧震”。为此经科判之祖)。

蜀资中弘沆法師疏(已佚。用天台宗三观义解此经之始)。

长庆道岷(yǎn)师《说文》(岷师为赵州禅师法嗣,《说文》别标一宗,为用禅宗话语解经之始)。

宋代：

永明延寿禅师《宗镜录》引释(禅师会三宗学者,撰《宗镜录》百卷,折衷法门,会归心要,多取证于《楞严》。所引古释,即憲、振、沆三家之说)。

携李洪敏法师《证真钞》(已佚,略见于《楞严义海》诸录)。

长水子璿《义疏》(法师传贤首教观,尤精于《楞严》,时称“楞严大师”。依贤首五教及慧振科判,采集憲、沆、敏、节诸家之解,释通此经,奉为准绳,在后世《楞严经》注疏中最为著称,被誉为“百代心宗之祖”)。

孤山智圆《疏》并《谷响钞》(用天台宗三止三观解释此经。间有未明,又撰《谷响钞》释疏)。

吴兴仁岳《集解》并《熏闻记》(岳师力扶孤山,张皇台观,集崇福以下诸解)。

北峰宗印《释题》(依天台宗观点,总括一经大义,解释名题)。